

## 本网专访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

——中华传媒网“力行十年”知名学者巡访系列

风光旖旎、山水合一的吐露港畔，在树林与楼宇的掩映之中，我们沿着盘旋的山间车道，几个回转来到山顶的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便坐落于此。在这里，我们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陈韬文博士。

*传媒网：陈老师，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中文大学，与您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和访谈。我们知道，自从1986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并回港任教以来，您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的访谈可否从对过往的回顾开始，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陈教授：好的。我本身出生于广东，上小学时也就是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移民到了澳门。在澳门念完小学就来到香港念中学，然后就去明尼苏达大学读了本科。所以也可以说在不同的地方都呆过一阵子。再后来，就回到香港，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白天在中学教课，晚上则创办和编辑了一份青年杂志，是名为《新一代》的双周刊，读者是青年学生。相比日间的教学而言，杂志的各方面工作强度更大，费力当然也更多。于是一段时间的劳累过后，我开始希望能通过对传播学的系统学习，在补充知识的同时也能休养生息。

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有 M.Phil. Program，我就申请并入学继续深造了，并准备念完书后再回传媒业界工作。但两年的硕士学习后，我发现自己面临着以抽象思维为特征的学术研究与以形象思维为核心的业界工作之间的抉择。最终，自己一直以来的抽象思维习惯还是潜在地决定了以后的发展方向。我当时拿到了 Research Assistant 的 Scholarship，就再一次来到明尼苏达念书，并于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香港中文大学，在这个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以前在中大读 M.Phil. 的时候，李金铨作为我的老师就支持我们去美国念书，后来他也去那里（明尼苏达大学）教书了。

*传媒网：当时，您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奖项。*

陈教授：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的导师是提出“知识沟”假设的蒂奇纳教授（P. Tichenor）。1986年，导师将我的论文送到 ICA 的 Mass Communication 部分的一个论文比赛，就拿到那个 Kyoon Hur Dissertation Award。后来就回来教书了。

*传媒网：从一些简介和成果上我们发现，您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学术兴趣非常广泛，包括政治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以及新闻业研究等，同时十分关注华人的研究主体性问题。这种学术志趣或者说学术关怀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陈教授：现在我的研究范畴虽然牵扯面比较广，但是主要和三个部分有关：一是新闻研究，二是国际传播，三是政治传播。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诸多研究大多位于上述这三个方面的交叉部分。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也与我的个

人兴趣有关。

我念大学是在 70 年代初，是世界变化很大的时代，其间有美国的反越战运动、第三世界独立浪潮、中国的文革，以及香港的社会变化等等。这些变动影响到了我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从此，社会运动、社会变动、世界的结构以及帝国主义都成为我在生活中日益关注的内容。

这一研究旨趣也逐渐开始表现在我对香港作为个案的研究中，比如我的硕士论文就聚焦于香港传媒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当然，之所以以香港为案例进行研究，其中一个基本背景是“九七”主权移交。因为，主权的变化必将对大众传媒产生影响，我开始思索权力结构的变动对传媒的各方面作用。从八四年开始，或者说撰写博士论文伊始，我便以此为重点。后来与李金铨合著的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便是这一阶段研究的结果。但“九七”以后，也就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的研究兴趣开始远离香港，逐渐倾向于国际传播。这主要是源于再没有新的情况，也没有超越我以前的想法。

*传媒网：后来，您的研究兴趣又转回到香港。*

陈教授：是的，2003 年的七月游行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社会运动又使我久已疏离的对香港的研究兴趣再度萌生。

在香港，“七一游行”是因为本土议题而形成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例。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讲，有组织地从上而下是传统的动员方式，而在 2003 年却是媒体的号召，加之人际网络的推动，从而形成规模很大的自发性动员。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传播的作用，我们能看到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互动。这些自发性运动更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景象，同时也是基于新媒体的作用。可以说，“七一”之后，民主的要求得到了强化。

*传媒网：相较以往，内地群体事件的研究近期也在日渐升温。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陈韬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做出类比。但是，内地和香港不一样。在香港，社会运动多是靠大众传媒来传播组织的，而在大陆却多采用新媒体例如网络和手机来实现自发性组织。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香港，大众传媒没有受到管制，新闻的及时性也高，因此发挥的作用也大。而在内地，对大众媒体的管制相对严格，而小型媒体、新媒体的空间则相对较大。在新媒体参与的社会传播中，虽然信息传播速度快，但舆论的领导角色并不明显，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但是在香港，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很多，一旦出现共识，有人号召就会形成自发性的动员。我相信，在现代社会中，今后这种运动会更多。

*传媒网：就您的研究来说，如何评价香港社会对主权转移前后的多方面“想象”？*

陈韬文：“九七”之前，香港人对回归的预期多被表述为“经济繁荣，政治萧条”。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经济出现低迷，而政治上却没有明显的干预。这和很多人开始的预期、想象相反。

以香港的新闻记者为例，我们利用调查去研究他们在采写新闻时对中国有无自我检查。我们发现，基于对统战等的畏惧，部分记者对中国政府确实表现为害怕，也因此出现了讨好的心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大概十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在批评中国时会有顾忌。但是这里面是想象的，还是有真实的原因？我相信有真实

的原因，但也会有想象的，两种情况都会有。

最近和李立峯等研究和写作时也提到，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很大，香港的部分新闻记者在看待中国时，其印象也同时在发生着变化。而诸多的批评因为这种观感的变好而日益减轻。李立峯认为这是一个 *co-orientation* 的过程，大家一起在变化。因此，我们看到这种过程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关系。

*传媒网：非常感谢您对以香港为案例所做研究的介绍。我们知道，国际传播在九七到零三年之间应该是您研究的主要领域，这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陈教授：实际上，对国际传播研究我一直是有兴趣的。像文化帝国主义，以香港作为特例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她经济上倚靠美国，同时开门迎接和吸纳各种不同的文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诸多理论假设不同的是，香港本土电影和电视在八十、九十年代都非常红火，甚至在电影方面可以说和 *Hollywood* 分庭抗礼。这使我感到很有趣。

实际上，在九七年，李金铨、潘忠党、苏钥机和我就利用调查来探讨不同国家记者怎样报道香港回归这个事情。这就涉及到对全球化理念的反思。我们发现，各国记者的报道并不是想象的一致，而是表现出非常本土化的倾向。各国记者为了引起派出国观众和读者的关注与喜好，首先还是选择按照国家利益和国家文化的框架来报道香港回归。因此，我们发现，全球化并没有导致传媒内容的统一。

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牵扯到国际传播层面的，包含内外的。这里面既有文化的部分，也有新闻记者、新闻内容的部分。因此，它们都是处于国际传播、政治传播、新闻研究重叠的地方。

我现在对香港本身兴趣减弱了，也是想到国际传播这个领域里面去探究更多的问题。比如不同记者虽然对同样事情表示关注，却又怎样根据自己文化系统的标准来报道。再比如“花木兰”，它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文本变成迪斯尼的产品，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我们对花木兰的创造。我相信这中间有一个对话。最终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边界在移动。

*传媒网：您成长和求学过程中身份的多元变化是否也与这一兴趣有很大的关系？*

陈教授：多方的了解肯定是有帮助的。比如关注文化帝国主义，就首先对世界文化结构有兴趣，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生存也保持关注。这就形成几个核心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在哪里，又如何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这种意识是和“五四”以来一百多年的关注一脉相承的。作为华人当然要面对这个问题。

*传媒网：延续“西学东渐”这个语境，您如何看待内地与西方之间的学术对话，尤其是近年来内地学界对西方学术体系的“拥抱”心理？*

陈教授：我觉得这就牵扯到个人的经历、文化认同和对什么是有意义的思考。每个人的研究和每个人的社会学有关，这样就不能离开自己的经验来设定研究议题。以我自己为例，如果谈到中外文化互相传播和影响，其间是否有文化帝国主义。我会觉得这是一种身份的归属感所形成的疑问。

我只是觉得不要太向内看，现在还是需要争论中吸收与学习。

*传媒网：您的这些分析和见解让我们很受启发。就学术研究来说，我们无法*

避免对立场的讨论，不管是个人还是学术流派都会处在一个学术政治的脉络当中，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政治身份？

陈教授：可以先谈一下我的研究取向。我的研究有时候比较宏观，有时候也比较细致和微观。同时，我要求方法上的多元，要善于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同一个问题；追求不同层次、不同方法的融合。总体来说，我的研究呈现出来的形式包括调查、内容分析、访谈、文献分析等等。在多元方法的基础上，我也一向主张，方法受到问题的影响。

如果上升到接近意识形态的话，我可能部分是自由主义的，部分又包含在批判学派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自己是固定的某一派。但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做学生时，批判主义的影响更大；后来，我对自由主义的有些主张也比较接受。总体而言不是很明显。不是说没有意识形态，但不是那种“摆明车马”的取向。

*传媒网：可否向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近期正在主持或参与的一些研究项目？*

陈教授：在复旦大学那边，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有关中国社会分层与传媒关系的研究，希望借此探究中国大城市中日益明显的社会分层与传媒使用的相应关系，同时也将考虑民众的消费意识、意见表达和文化认同等因素。

另外一个国际传播研究，有一个国际的大型比较研究项目在进行。这个项目要比较十几个国家中公共电视和私营电视的新闻。当然，中国和香港也都是作为特例进入研究视野的。

*传媒网：面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日益增多的趋势，我们一方面要思索“扩招”对教学、科研乃至就业等社会问题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也要注意国内众多新闻传播学子在这一大潮中所表现出的学术热情和研究潜力。您曾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一文中从制度层面做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在此，您能否对众多的学子提出一些学习和研究方面的指导？*

陈教授：首先要讲的还是中国研究生课程面临改革，需要思考问题在哪里，怎样改革才能跟上世界传播学教学的步伐。现在的做法变动太慢，太墨守常规，从而导致了人才培养的缓慢。因此，就需要打破森严的师徒制和门第制度，设立集中资源来搞好教学，让学生们修课。另外，要加强训练。因此，理念上不要太内看，打通内外应是一个目标。

反过来，就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而言，在既有的制度内，虽然制度上不鼓励，但还是建议同学们向不同的老师求教，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习。要敢于突破压力，和其他的老师谈话，自己建立自己的老师网。同学之间也要有合作，不要有门第的观念，可以搞一些读书组，多讲一些，多听一些，会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帮助。

学术资源方面，大家要争取多看原版书，主要是因为内地的翻译水平还相对有限，尤其是对原意改变较多。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在国外读书的朋友获取学术论文的pdf版本。另外，Routledge和Sage每年出版的传播研究期刊都是可以免费从网上查阅到的；几本中文学刊也是免费开放的，这些华人学者的训练相对完整，可以为大家的学术研究打开门路，有一些参考价值。

中国的学生通常很聪明，很努力，如若加一些好的训练，将会有很大的进步。

*传媒网：最后，请您介绍一下《传播与社会学刊》今后的一些发展思路。*

陈教授：《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刊期已经改成一年四期。按照海外学刊的标准来说，这已经是很正规，可以维持很久的了。我们希望学刊的质量继续提高，

会有更大的影响。

现在学刊的内容架构已经基本完整，主要包括“学术对谈”（对当今全球权威学者的访谈）、“研究论文”（每期保持五、六篇的规模）、“传播论坛”和“视觉·文本”（2009年第1期开始刊发）。学刊至今一直没有“书评”这一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是想以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为主体，学生们也可以从中学到较好的论文是怎样做的，这具有基础性意义。

传媒网：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 附：陈韬文教授简介

CHAN, Joseph Man, Professor 陳韜文

B.Sc. & Ph.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Phi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or:

Recipient of the Changjiang Chair Professorship (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for which he is affiliated with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while continuing his servic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warded ICA Fello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14.